

从涉海历史到海洋整体史的思考

杨国桢 (厦门大学历史系)

面向海洋
走向海洋

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的兴起,与中国“新史学”的诞生同步,已有百年的历史了。从20世纪20、30年代的“南海交通”,到80、90年代的“海上丝绸之路”,经过几代学者的耕耘,取得丰硕的成果,其他涉海的专门史研究也纷纷开辟,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肯定。然而,在中国历史体系和教科书中,中国古代社会仍是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的二元结构。在这种陆地历史结构和权力话语体系中,中国海洋发展的种种事实,都被诠释为农业文明的海上延伸。比如说:

——海洋捕捞是陆地农业向海洋农业的延伸;靠海吃海发展起来的蚝田、蚶田、潮田等均从田意,正是大农业属性的生动反映;

——舟中各洋皆有秘本,名曰“洋更”。这种航海手册在秘制珍藏的情况下,它只能为单一的家庭生产单位所拥有;

——海外经商的船只,常由许多商人合资购置,搭载的小商贩各拥有自己的舱位。经济上独立,脱不开小农生产的方式;

——海上南北漕运只是陆地南北漕运的一种选择和替代;海上丝绸之路只是陆地丝绸之路的选择和替代;

——海塘、潮闸、沿海卫所的建筑,均是保卫农业区的生命财产的,与北方内陆的万里长城无本质区别;

——中国海洋文化的本质是海洋农业文化。

诸如此类的说法很多,质疑者很少。在这种思维定式下,即使承认中国古代有海洋文化的人,也只能得出它“无法逆转地被内陆农耕文化所同化”的悲观结论。

这些论述符合中国海洋发展历史的真实吗?

一 理论的反思

自从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人类社会的发展取向由大陆转向海洋,导致西方的兴起之后,海洋

史就受到西方学者的极大关注。19世纪后以欧洲中心论构建的世界历史体系,用海洋代表西方、现代、先进、开放,大陆代表东方、传统、落后、保守的论述,取得话语的霸权,支配了海洋史研究的主题领域。

这种海洋史理论,是以海洋文化为先进文化形态为前提的。它之所以先进,在于代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路径。按照这一标准,中国没有进入资本主义社会阶段,即使古代有发达的航海,也不可能创造出海洋文化。

现代西方史学研究的进展表明,海洋文化和资本主义并没有天然的联系,海洋文化成为资本主义的标签和专利,是西方扩张海洋霸权制造的神话。从这一神话走出来,海洋文化是与陆地文化相对应、依存于海洋和海岸带的人文类型,有从初级形态到高级形态的演进过程,有开放、进步或封闭、保守的不同模式。有海洋群体活动的沿海国家与岛国,都有自己的海洋文化。海洋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空间,在古代历史结构和体系中,不再只是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的二元结构,不能无视海洋世界的存在。海洋史不再只是西方海权扩张史,扩大为海洋视野下一切与海洋相关的自然、社会、人文的历史研究,从理论上说,包括海洋的自然生态变迁的历史和人类开发利用海洋的历史、海洋社会人文发展的历史。

从海洋视野看中国,海洋发展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取向。海洋社会人文是中国社会人文的一种类型。中国海洋社会人文缘于海洋而生,有自己独特的起源和发展的规律。古代中国多元一体,传统农业人文占优势地位,海洋社会人文处于边缘地位,长期停留在区域和民间的层次,没有被选择为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要取向,但不等于选择海洋发展取向的可能性完全丧失。海洋发展传统在海洋区域始终一脉相传,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具有延续性。这种历史的联结,为当代中国选择改革开放,东出海洋与世界互动的发展战略提供了可能,储蓄了能量和动力。海洋发展取向从边缘走向中心,以东部沿海为龙头,带

动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和中部的振兴,实现和平崛起,是人们在多种可能性中抉择与互动的结果。

站在这个历史的高度去审视历史结构的变迁,有必要将海洋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一个小系统加以研究,更新研究思维和研究方法:

一. 要树立以海洋为本位的研究思维。所谓以海洋为本位,即站在海洋活动群体的角度观察思考问题,而不是站在陆地看海洋,把研究陆地历史文化的模式套用于海洋历史文化研究。

首先,要破除海洋发展是农业文明的海上延伸的迷信。远古滨海先民的海上漂航不是农业部族的行为,舟船也不是农业部族的创造。他们与环中国海第一岛链、第二岛链之间的联系比与大陆腹地的联系更为密切。汉民族进入沿海地区,带来先进的农业文明,建立农耕聚居,但不是北方农业社会模式的复制,而是因应新的环境有新的创造,同时又和当地土著涵化,吸收了滨海先民的海洋传统,具有陆、海的双重性格。一部分人以海为生,结成海洋活动群体,一部分人则陆海两栖,形成半农半海、主农副海、主海副农等过渡的或混合的人文类型。这是海洋文明与农业文明互动,影响农业文明的例子。黑格尔所谓古代中国人和海“不发生积极的关系”,是指大陆中国以农为本的汉人和海不发生积极的关系,航海“没有影响于他们的文化”,是指没有深层次地影响汉民族的核心文化、精英文化。从这样的理解去看,我们不能简单地说黑格尔否认中国有海洋文化,但必须指出,黑格尔这样的概括至少是偏颇的,因为说古代中国人的海洋观念是属于农业民族的,是就陆地主体人群而言,不能等于中国海洋活动群体的海洋观念也是农业性的。

其次,要充分发掘海洋历史资源,特别是海内外的沉船文物、海洋活动群体及海洋移民社会的聚落遗址遗物和民间文物,以提供海洋历史发展延续性的证据。同时,重新搜集审视现存历史文献中的海洋信息,予以准确的解读。海洋活动群体的集体记忆很少用文本形式保存下来,针路簿、航海日志、海图、契约、账册、书信之类遗留至今已属凤毛麟角,仅是大海的浪花,历史的碎片。而被主流社会精英文化接纳的海洋信息,基本上是官员和沿海士大夫的记录,用农业文明的权力话语叙述,不乏偏见和误解,需要甄别筛选,才能过滤出真实的内涵。

二. 要采取科际整合的方法。海洋问题的自然-社会-经济的复合性,需要跨越学科界限的综合性方法来索解。在历史研究中,可以借助其他涉海学科

的研究概念,进行历史学和其他相关学科的概念磨合,实现相互联结、贯通,为我所用。如历史学话语中的沿海区域研究,以陆域为中心,海洋仅是附属,我们借助海洋学的概念,在区域史研究中专门划出海洋区域,以海域为中心,包括海中的陆地(岛屿)和海岸带陆域(有海岸线的县市);又借助海洋经济学的概念,把和海洋有依存关系、直接和间接利用海洋的经济从农业、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等部门经济分类中剥离出来,重建海洋经济系统;借助社会学的概念,把向海洋用力的社会群体、社会组织加以整合,重建海洋社会系统;借助宗教学、文化学的概念,重建海洋文化系统。这样似乎比较符合海洋区域史研究的需要。对海洋经济史、海洋社会史、海洋思想文化史等的研究,也有不同学科但类似的概念磨合。我们深知,具体的研究对象和研究主题,有不同的科际整合方法,必须经过长期学术实践的反复校正,探索出符合海洋整体史要求的概念内涵,才会最终为历史学界所承认,纳入历史学的学术规范。因此,科际整合的成功与否,需要时间的考验,允许试错是十分重要的。

二 学术的实践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从海洋社会经济史入手,向海洋社会文化史延伸,作了一系列的专题试作(主要是博士学位论文),其中20种收入《海洋与中国丛书》和《海洋中国与世界丛书》出版(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2005年)。十多年的学术实践,主要围绕以下方向:

一. 海洋区域史研究。包括海洋区域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文化的综合研究和个案研究。拙作《东溟水土》以东海海区及其两岸的海岸带为海洋区域单元,探讨历史上生态环境与经济开发的互动关系;《闽在海中》,追寻福建海洋发展的人文信息,对福建海洋区域和航路变迁、海洋发展模式、航海与移民活动、内陆参与海洋发展等问题和个案作了专题探究。罗一星的《明清佛山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探讨地处南海海岸带上的佛山,因应海洋经济的兴起、海内外市场的推动,从乡村城镇向区域中心城市的发展历程。杨强的《北洋之利》以古代渤海湾区域为研究对象,勾勒该区域传统海洋经济的发展脉络及其对本区社会、文化的影响,揭示北方传统海洋经济的特点。张彩霞的《海上山东》,着重从近代山东沿海地区的社会经济转型,分析海洋因素的作用。

二. 海洋经济史研究。包括海洋产业史、海岸带

开发史、岛屿开发史、海洋贸易史等方面长时段或断代的专题研究。欧阳宗书的《海上人家》，探讨中国海洋渔业的自然环境与开发背景、渔场的发现、海洋渔业的发展、海水养殖业和远洋渔业的兴起、现代渔业的走向和可持续发展。刘森的《明清沿海荡地开发研究》(汕头大学出版社,1994年),探讨中国沿海海岸线的历史变迁,滩涂荡地的开发利用,海岸带农业、盐业的开发模式,南北沿海荡地开发的异同。蓝达居的《喧闹的海市》,探讨闽东南港市的兴衰,从海陆人文互动及国家与社会互动的角度,分析闽东南港市社会陆海兼具的双重性格。吕淑梅的《陆岛网络》从台湾海港的兴起入手,切入台湾岛及其附属岛屿的开发历程。陈东有的《走向海洋贸易带》,探讨内层贸易带(内陆)与中层贸易带(海岸带)、中层贸易带与外层贸易带(海外)的市场互动。张晓宁的《天子南库》,专论清前期实行广州一口对外通商制度下的中西贸易,指出这一保守制度在抑制和扭曲中国海洋经济自然发展进程的同时,中西海洋经济在广州市场上的碰撞在客观上又对广东和其他地区的经济产生不同层次的推动。

三. 海洋社会史研究。包括海洋渔民社会、海商社会、海洋移民社会的社会组织与管理等方面。欧阳宗书的《海上人家》,探讨了沿海渔村的社会变迁、渔政管理、海洋社会的少数民族。陈东有的《走向海洋贸易带》,探讨近代世界市场互动中的中国东南商人行为。连心豪的《水客走水》,探讨了近代海洋走私活动群体,海关的海上缉私。我和郑甫弘、孙谦的《明清中国沿海社会与海外移民》(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探讨了明清海外移民社会地缘组织、血缘组织、秘密社会的渊源,海外移民与沿海侨眷家庭、近代经济组织、新式教育组织、侨乡社会组织演变的关系。曾少聪的《东洋航路移民》,探讨明清海洋移民台湾与菲律宾的背景、过程和建立移民社会的实况,着重比较海洋移民国内发展与国外发展两种模式的异同及作用。林德荣的《西洋航路移民》,以西洋航路移民为研究对象,分析闽粤移民社会在荷属东印度和英属马来亚的不同遭际。曾玲的《越洋再建家园》,研究新加坡华人社会文化,认为源自闽粤祖籍地的传统民间文化,是华人在海外再建其社会结构的基本文化资源,同时在新的社会文化脉络下发展出具有本地特色的形态。刘正刚的《东渡西进》,以闽粤移民台湾与四川为例证,作国内的海洋移民社会与陆地移民社会的比较研究。

四. 海洋思想文化史研究。黄顺力的《海洋迷思》,探讨中国海洋观的传统与变迁,分析古代海洋

观的产生、形成和特点,明清两朝在禁海、开海政策张弛交替下海洋观的变迁,鸦片战争后海洋观在内外双重压力下由传统向近代转型的历史过程。王荣国的《海洋神灵》,从虚幻世界入手进行中国海洋文化研究,构筑海神家族谱系和海神信仰的时空结构,探讨了海洋渔民、海洋商人、海洋移民群体各自的海神信仰状况,海神信仰的区域特点和各信仰群体的不同祈盼,海陆互动中海神与陆神的角色互换。

五. 海洋考古研究。海洋考古是以实践为基础的海洋人文史学研究,是考古学和历史学研究的新领域。吴春明的《环中国海沉船》以海洋考古发现与历史文献相印证,通过沉船遗骸本体结构、属具的历时排比,再现中国古代帆船形态与结构、造船与航海技术的演进过程;依据沉船遗迹的空间分布规律,探寻中国船家驰骋的海洋航路网络;从船货遗存构成,追究腹地生产、港市集散、海外流通体系。

六. 海洋政治和人物研究。崔来廷的《海国孤生》,把海洋社会研究与人物研究相结合,探讨明万历朝首辅叶向高对海洋事务的观察和思想,从叶向高与海洋社会的关系,说明部分海洋活动群体的利益在政治中枢得到反映。李金明的《南海波涛》,围绕东南亚国家在南海问题的争议,分析海洋资源大发现后的海洋政治走向。

七. 海洋灾害史研究。于运全的《海洋天灾》,对中国历史上的海洋自然灾害的类型,对沿海社会经济的破坏和影响,预防与救灾,作了系统梳理和探究。

这些试作在追求中国海洋史整体框架、改变涉海历史研究重南轻北、重经济轻社会等研究失衡状况下了工夫,扫除一些盲区,填补了一些空白,但还只是阶段性的成果,初步搭建了研究平台而已。由于作者的学术背景、知识结构、理论素养、磨合能力等都稍嫌不足,难免存在跳不出旧思维、旧模式的缺陷。因此,在研究领域、研究主题、研究概念、研究方法上还有很大的创新发展空间,需要不断地探索和开拓。

三 为中国海洋史论述开新局

上述理论的反思和学术的实践,都是为新一代学者继承前辈和先进学人的优秀研究成果,提出新的中国海洋史论述搭桥铺路的。我们的初步结论是:

一. 中国是东亚的大陆国家,又是太平洋西岸的海洋国家,历史发展兼具陆海两个方向。这两个方向的抉择和互动,贯穿了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但是,主导中国传统官方史学是以中原为中心的、以大陆

性文化为基础的历代王朝政治,在这样一个传统史学思维与人文视野中,海洋文化长期处于附庸地位。

二.海洋活动群体的产生早于国家的形成。海洋活动群体之间的互相接触,早于国与国之间的海洋联系。在有文字记载以前的史前时代,环中国海周边的族群已通过舟筏漂流的海洋探险活动持续接触和交流,形成互动的文化和语言圈。上古时代在今属中国的大陆边缘带上的东夷、百越,与西太平洋岛屿带上的部族具有亲缘关系。

三.中国在国家形成的过程中,不只是农业民族的共同体,而是多元一体的,包涵了海洋民族的成份。农业民族移入海岸区域,与夷人、越人融合,一部分人保持了陆地的生活方式(城乡社会群体)或海洋的生活方式(水居社会群体),一部分人变为海陆两栖(渔民、船户、海商等海洋活动群体)。中国古代海洋活动群体所依托的海洋区域,包括今天的朝鲜、韩国、日本和东盟国家的海岸区域在内的环中国海,并向印度洋和东太平洋延伸。海上接触的对象,包括东亚与西亚之间不同民族的海洋活动群体,与环中国海原始文化和语言圈的互动具有延续性。从宋元以来的海商贸易网络、海洋移民散居网络到当代的世界华商网络,是在不同时空条件下的历史传承。

四.外向海洋、内向陆地是海洋区域发展的主要取向。从国家的层次看,中国海洋发展取向在与陆地发展取向的抉择中,长期处于边缘弱势地位,从边缘到中心的移动举步维艰。但从跨国的环中国海区域看,中国海洋发展取向起了主导的作用,对海岸地区和海上周边国家产生重大的影响。跳出中国地理和行政的界限,以海域为中心,从海洋看中国,才能把握中国海洋发展的全局。

五.大航海时代以来中国海洋发展的现代化进程曲折反复,既有西方的影响、制约或促进的因素,又有自身的传统惰性与历史潜能的因素。一度丧失海洋国家的地位,不能否认中国既是大陆国家又是海洋国家的历史事实。

当然,要改变海洋霸权理论的思维,创新中国海洋史论述,任重而道远。未来的发展方向,似是现有的各种涉海的专门史研究,都从构建整体史的目标再出发,打破相互隔离的学科界限和研究失衡的现象,整合出若干综合研究课题,形成历史学的主题领域,打开新的局面。我们愿意和大家一道,继续为此努力。

(责任编辑:周广明)

面向海洋
走向海洋

海洋国土——新国土观

一个主权国家国土的基本组成有三个内容:陆地、水域和天空。联合国《21世纪议程》指出:海洋是全球生命支持系统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也是一种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

中国长期“重陆轻海”,传统的大陆观使民族视野囿于陆地而忽视海洋,直至当今烙印犹存。酷爱祖国半壁江山,却对海洋显露冷漠和陌生。我们长期受到“领土就是国土”的教育,从小就知道祖国国土面积为960万平方公里,但这个大陆概念其数值仅是陆地国土的测量面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我国还有37万平方公里面积的内水和领海,这部分海洋国土未被计入国土面积中是我国地理上的重大误区。所以,根据《公约》来建立准确、完整的国土观是十分迫切的现实问题。根据《公约》条款及海洋专家们的意见,可以建立下述国土观和数量概念:将置于一个国家主权或管辖权下的所有地域空间称为国土。其中置于国家主权下的地域空间的陆地部分称为陆地国土,我国陆地国土面积为960万平方公里;置于国家主权和管辖权下的地域空间的海上部分称为海洋国土。根据《公约》,国家管辖海域除内水、领海外,还包括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我国海洋国土面积约为300万平方公里。

一个沿海国的陆地国土和海洋国土面积的总和构成完整的国家国土,所以我国的国土面积应为1260万平方公里。

摘自倪建中主编:《海洋中国》,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7年